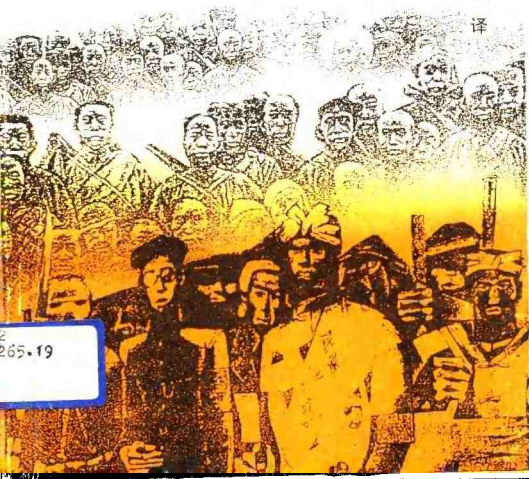


山西 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 和 民众动员

〔日〕内田知行 著
田西如 译



92
K265.19
2
2

山西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和民众动员

(日)内田知行著
田西如译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2年·北京



B

952023

(京)新登字 071 号

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民众动员

[日]内田知行著 田西知译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北京 1929 信箱 中央党校南院)

印刷：山西省建筑科学研究所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32 开 4.3 印张 106 千字

1992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199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000 册

ISBN 7-80023-540-3/K·518

定价 3.50 元

中 译 本 前 言

本书是宾户宽、内田知行、马场毅、三好章、佐藤宏所著《中国八路军、新四军史》中一节《牺牲救国同盟会和山西新军》。在翻译出版之际，把标题改为《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民众动员》。

《中国八路军、新四军史》是有关中国八路军、新四军历史的研究成果。我执笔山西省的抗日运动史；马场执笔山东省八路军和其根据地建设的经过；三好执笔江南地区新四军的建军和成长过程；佐藤执笔晋察冀的民众工作，尤其是征兵动员的经过。宾户写了概说。

如上所述，该书反映了执笔者们对于不同的历史问题有各自的见解，然而，对于基本主题——中国共产党军（八路军、新四军）执笔者们却有着共同的见解，那就是领导中国的抗日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领导了抗战。但是，共产党提倡并实践了政治上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军事上所采取的游击战术的人民战争，并且成功地调动了中国人民大众持续的抗日热情。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根据地和游击地区，由于培育了民主主义，成功地把民族主义的觉悟转化为抵抗侵略的战斗力。这正好和在日军占领区民主主义被彻底否定的事实成为鲜明的对照。以上所述是执笔者们的共同见解。书中不仅仅叙述了军事史，而且充分地考察了政策的展开过程。尤其对于游击地区和根据地政府对农民政策的考察，作了很大的努力。这

点可以说是五位作者的共同之处吧。

值此本书的中译本出版之际，我想叙述一下我对山西省现代史的研究情况。

本书考察了从一九三七年七月到一九四〇年一月山西新军结束的山西省抗日运动。考察的主要对象是牺牲救国同盟会。本书主要阐明了以下两点：第一，山西的共产主义者在创立统一战线的过程中，动员民众抗日，实现政治改革，虽然还不彻底，但它大大地促进了社会改革。第二，共产主义者虽然遇到军事冲突，但把冲突抑制在最小范围。为了打好新的抗日根据地的基础，建立了晋冀豫边区、晋绥边区。

有关中华民国时代的山西省的历史，我至今用日语发表了以下论文：

(1)《牺牲救国同盟会史序论：抗日战争初期山西省的民族统一战线和民众动员》(现代史学会编刊《季刊现代史》第六号一九七五年八月)

(2)《新军事件：山西省抗日斗争的转折点》(一桥大学编刊)《一桥论丛》第七十五卷第五号一九七六年五月)

(3)《阎锡山政权和三十年代山西省的经济变动》(现代中国学会编刊)《现代中国》第五十八号一九八三年四月)

(4)《阎锡山的民众统制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增渊龙夫先生退官纪念论集刊行会编)《中国史上的社会和民众》一九八三年五月)

(5)《阎锡山政权的财政整理事业：关于30年代中国军阀地方割据的考察之一》(一桥大学编刊)《一桥论丛》第九十一卷第六号一九八四年六月)

(6)《三十年代阎锡山政权的财政政策》(亚洲经济研究所编刊)《亚洲经济》第二十五卷第七号一九八四年七月。中文译文、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刊《山西文史资料》一九九一年三

月)

以上论文中，(1)和(2)采取的是和本书原文同样主题的研究。在(1)中可以看到牺盟会在抗日运动中发挥的作用，时期为一九三六年秋牺盟会组成到一九三八年秋山西省全省陷落。在(2)中指出了由于牺盟会抗日力量的壮大给阎锡山的统治体制所造成的威胁。同时，考察了两者矛盾的激化直至武力冲突的政治过程。在着手准备(1)和(2)的当时，中国国内现代史研究还未恢复，日中之间也没有任何学术交流。因此，我只能依据日军留下的秘密资料和日语的公开文献以及台湾的国民党方面的历史资料来进行分析。为此，要对牺盟会动员大众的经过和其问题、新军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来作具体考察就极其困难了。例如，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和牺盟会的关系，牺盟会和公道团的关系、秋林镇会议以后的新军改编等等，遗留了不少是悬而未决的课题。这类课题研究的考察，在中国只能等到学术性出版事业的恢复。进入八十年代，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一九八一年)、山西省社会科学研究所编《山西革命回忆录(第一辑)》(一九八三年)等文献开始出版。复刊的《山西文史资料》也可以得到了。从那些文献、资料中可以利用到不少珍贵的证词。本书原文就是这样在依据中国出版的新的文献、资料，全面改写(1)和(2)的情况下，于一九八五年的夏天大致脱稿的。从这点来说，本书也是改革、开放时代学术研究的成果之一。

进入八十年代，我开始把研究对象从牺盟会转移到阎锡山政权。共产党和牺盟会组织了中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进行的民族主义的抵抗是显而易见的事实。我认为这点无论如何强调也不过分。但是，在继续研究不久，我感到仅仅研究牺盟会和共产党是否带有片面性呢？为了更具体、更客观地了解山西省的地方史，不是也应该考察一下阎锡山政权的统治史呢。以这样的问题意识为起因发表的过渡期研究是(4)。在(4)中分析了一九三二年——

九三七年的政治变动。考察了阎锡山的内政机构在承受了三种外压(①日本的华北分离化政策、②共产党的山西“东征”、③国民政府的中央化政策)以及内压(省内的城市知识分子、青年阶层的政治改革活动)的情况下,不得已进行转化的过程。我在(4)中对于阎锡山作为一个政治家的主体选择过程——从反共到联共抗日的转化予以了评价。此后,我发表了若干有关阎锡山政权经济政策的论文。其(3)分析了产业政策,(5)(6)分析了财政政策。(3)叙述了三十年代中期的产业政策——构思了在计划阶段,取代进口的轻工业建设和公营企业为主体的重工业建设的并存的思想。但是,结果是由于实际上偏重于重工业的工业化的发展,以及在还没有见到成果时,抗日战争的爆发打碎了阎政权的这些政策。三十年代阎锡山进行了以减轻田赋附加税和废止苛捐杂税为两大支柱的财政整顿工作。(5)从这财政整顿工作的侧面分析了阎政权的割据统治所内含的问题点,指出了这项工作没有合乎阎政权当初的意思,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实效,那是因为最终没能掌握县级行政机构的财政的缘故。(6)从财政收支构造的侧面分析了阎政权的割据统治丧失了其财政的基础的过程。叙述了阎政权经常地扣压巨额国税(中央税)以及巨额军费的支出抑制了产业开发的投资的过程。并且得出以下结论——由于共产党的山西东征和山西军的绥远抗战,加快了这样的过程,阎政权不得不停止了对国税的扣压。

现在我对于阎锡山政权的统治史,特别是其在三十年代的经济政策非常感兴趣。其理由:第一是因为考虑到更具体更客观地了解山西省的地方史,必须了解既是共产党的敌人又是统一战线的对象——阎锡山政权。第二是因为考虑到是不是可以把三十年代地方军阀的政策性摸索作为“开发独裁型”权力者的先驱来进行再评价呢?可以说军阀的地方割据统治在政治上确实起了反动作用。但是在为了强化地方割据统治而实施的社会性的经济政策中不也有某些顺应历史潮流、乃至领先于时代的政策吗?就阎锡山政权

而言，在三十年代前半期就兴办了各种公营事业。根据“山西省十年建设计划”着手于重工业化。整备了以省银行为首的银行网、依据“物产证券”的理论提倡了某种通货管理制度。这些政策在二十年代末期以前的阎政权是看不到的。纵观三十年代当时的中国阎政权的这些政策可以说是相当具有开创性的。固然由于币制改革以后的国民党政府所采取的统一化政策作为地方实力者的阎锡山的实力被削弱了。并且，由于一九三七年的日中战争的全面爆发，阎锡山的社会性经济政策成了泡影。但是我认为如果着眼一下这些政策不是可以把阎称为七十年代以后发展中国家出现的“开发独裁型”的先驱者吗。然而对于“军阀”这样的见解也许和建国后的中国对于军阀的历史评价有着不少距离吧。

最后，我要对担任本书的翻译者——田西如先生（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深表谢意。田先生在繁忙的本职工作之余，花了一年半时间，忠实地翻译了原文。我是从一九七四年左右开始研究山西省现代史的。从那以后一直盼望着能去山西省访问。一九九〇年八月，我终于实现了多年的愿望。在那次旅行中，不少朋友们热情地接待了我，并且在学术研究领域中也得到了许多珍贵的指教。就在那时在太原初次见到了田西如先生。从那以后，从作为研究的先辈那里得到不少有益的指教，直至今今。这次能请到现代史、特别是山西省现代党史的专家田先生担任本书的译者，感到非常荣幸。

冈田 知行

一九九二年八月于东京

目 录

开头语	1
第一章 统一战线和抗战动员(一九三七年七月至一九三八年三月)	3
第一节 山西的战局和阎锡山政权提出的进行抗日动员的五项政策	3
第二节 山西省内中国共产党的活动	6
第三节 抗战初期的牺盟会	10
第四节 山西省总动员实施委员会的建立	15
第五节 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战地总动委会)的成立	17
第六节 山西新军的建设(之一)	20
第七节 山西新军的建设(之二)	26
第八节 抗日行政机构的形成	33
第九节 民族革命大学的创立	38
第十节 动员农民的政策	39
第二章 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一九三八年四月至一九三九年二月)	49
第一节 民族革命同志会和民族革命青年团	49
第二节 牺盟会吸收合并公道团	52
第三节 抗日行政机构的改造	54
第四节 一九三八年山西新军	60
第五节 牺盟会、中共同阎锡山的关系日益紧张	67

第三章 新军事事件(一九三九年三月至一九四〇年一月)	75
第一节 秋林会议	75
第二节 改编新军	77
第三节 阎锡山的攻势	81
第四节 牺盟会、中共的对策	85
第五节 占领与抵抗	91
第六节 新军事事件前夕	93
第七节 新军事事件	99
第八节 新军事事件之后	106
结束语	114
译后记	田酉如 118

开 头 语

本书研究的内容,是从抗日战争开始(一九三七年七月),到山西新军事事件结束(一九四〇年一月)时期的有关山西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运动与武装动员运动的历史。要考察这一阶段中中国共产党(以下简称中共)同阎锡山结成统一战线运动的历史,就必须研究两方结成的抗战政治团体牺牲救国同盟会,这是研究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运动的焦点。本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阎锡山政权及其领导的直系军队,牺盟会同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及他们建立起来的新型军队——山西新军。考察山西新军的焦点是武装动员运动。

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国各地普遍开展了抗日统一战线运动和武装动员运动。山西省是中国民众动员比较先进的地区。民众动员直接关系到民众的利益,能够把民众动员的力量组织成政治的(进行抗日)、军事的(开展游击战争)和从事生产的力量。中国共产党的民众动员有丰富的先进的经验。山西省是中国最早结成抗日统一战线的省份。研究山西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运动,可以更深刻地了解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实行的各项政策。因此,本书选取山西省作为研究的典型。

从山西省抗日政局的发展考虑,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时期:第一时期从抗日战争开始到日军在山西省南部占领临汾(一九三八年);第二时期从阎锡山亡命逃跑到陕西省宜川县秋林镇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前夕(一九三九年二月);第三时期到新军事事件结束。第一时期,是阎锡山在抗日统一战线内,通过牺盟会进行抗日武装动员的阶段。第二时期,是抗日统一战线内牺盟会建立游击政权、推进民主政治、全面展开武装动员的阶段。第三时期,是抗日统一战

线开始破裂,牺盟会、新军受到强制性的限制,最终导致阎锡山采取军事手段,挑起军事冲突的阶段。以下,本书从上述三个时期分别论述。

第一章

统一战线和抗战动员

(一九三七年七月至一九三八年三月)

第一节 山西的战局和阎锡山政权提出的进行抗日动员的五项政策

七月七日夜卢沟桥事变发生到本月末，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侵略。同月二十八日到三十日，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北平、天津两市。八月九日在上海发生大山大尉事件，日军借口向上海发动进攻。从此，日本以军事侵略行动侵占了华北、华中两地的大多地方。

战局扩大，对阎锡山政权形成威胁。开战半年中，阎锡山陆续提出五项进行抗日动员的政策。七月下旬，山西省总动员实施委员会成立。这是五项政策的第一项。

八月下旬，山西省北部的晋北受到日本军队的威胁。八月二十七日，日军占领了察哈尔省省会张家口。此后，沿平绥铁路向西推进。九月初，日军进入山西境内，十三日，日军在遭抵抗后突破防线占领了大同。日本军队从山西北部南下，深入山西境内。绥远方面的日军向西推进。九月二十四日日军到平地泉，十月十四日占领了绥远，十月十七日沿平绥铁路西端向包头进攻。沿同蒲铁路南下的日本部队，在九月二十七日突破雁门关。

八月一日，阎锡山乘飞机赴南京参加蒋介石召集的国防会议。会上，阎锡山被委任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指挥山西、绥远两省的

中国军队。山西、绥远的晋绥军由两个集团军编成。第六集团军的总司令为杨爱源，副总司令为孙楚。第七集团军的总司令是傅作义。中共领导的红军改编成八路军(后改名为第十八集团军)后，由朱德任总司令，并兼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

在民族危机日复一日益加严重的情况下，阎锡山采取了以下一些进行抗日动员的政策。八月一日，成立了青年抗敌决死队(以下简称决死队)第一总队；紧接着成立了山西工人武装自卫队(以下简称工卫队)。这是山西新军建设的开始，也是阎锡山五项抗日动员政策的第二项。九月下旬，在雁门关地区十八个县成立了“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以下简称战地总动委会)，这是第三项。九月到十月之间，建立了游击行政区和游击县长制度，进行战时地方行政机构的改革，这是第四项。

战时抗日政策的实施，是适应战局恶化而采取的措施。日军突破雁门关的部队是从东北调来的关东军主力兵团第五师团。九月二十五日，第五师团在平型关遭到林彪率领的八路军一一五师的急袭打击，吃了大亏。第五师团立即调援军到平型关地区，三十日突破平型关。

平型关战役是八路军单独对日作战的一次有名的八路军胜利战。此后，国民党中央系统的高桂滋军在平型关左翼，刘茂恩军在凌云口、恒山一带，八路军在右翼，晋绥军的四个师和数个旅在正南配置。中国军队的总兵力有六至七万人，部置在防御战线上，由第六集团军总司令杨爱源负责总指挥，实行对日防御作战。

十月十三日，日本军队在离太原八十余公里向晋绥军主力部队防守的忻口镇的阵地发动攻击。中国军队在阵地上坚决果敢地展开抗击。刘茂恩军在右翼、郝梦龄、陈长捷部在正面；李默庵、郭宗汾部在左翼配置。中国阵地上的总兵力有八万余。卫立煌任前敌总指挥。在忻口战役开始的二、三日内，中国方面的军官、士兵战死一万余名，负伤者达二万名以上。八路军一二九师袭击了日本军

队后方的代县阳明堡飞机场。

与忻口战役同时进行的，是日本军队沿正太铁道的西进。山西东部的要地娘子关在十月二十六日被日军突破。三十日占领了阳泉。太原已在日军进迫之下，忻口镇的侧背已受到严重的威胁。十一月二日，中国方面从忻口阵地上撤退，山西军队的主力开始总崩溃。十一月八日，山西省会太原落入日本军之手。在这种情势下，阎锡山的第二战区长官部、太原绥靖公署（管辖山西、绥远两省的军政机关）、山西省政府等机关撤退到临汾。与此同时，阎锡山的政权加紧拟定抗日动员的具体办法。一九三八年一月成立了民族革命大学（以下简称民大）。这是阎锡山进行抗日动员政策的第五项。民大是仿照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的办学方针设立的培养抗日干部的教育学校，在临汾失守后为各地输送了大批人才。

一九三八年二月初，阎锡山准备发动反攻太原作战，并再次扩编山西军队。日本军队从北向南推进，阎锡山军队败北。二十六日，阎锡山撤离临汾，向西面的吉县转移。三月初，日本军队从临汾向西，向南推进，到达黄河北岸。一九三八年春，山西省内的主要交通线、主要城市都被日本军占领。此后，阎锡山军的主力撤到晋西，掌握数县的政权。从此，阎锡山的抗日态度逐渐消极起来。在其他地方，由于实施了五项抗日动员政策，在游击地区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五项抗日动员政策，是阎锡山亲自决定实施的。除第一项外，都是阎锡山自己决定制定的，是他自己进行抗日的具体办法。同时，也是在牺盟会、中共——实际上牺盟会内有许多中共干部，他们以牺盟会员名义出现——的恳请、要求、忠告之下的结果。

第二节 山西省内中国共产党的活动

一、八路军驻晋办事处

八路军驻晋办事处是公开挂牌活动的。据八路军办事处的秘书兼管无线电台的岳夏回忆、张学忠介绍《彭雪枫日记》文章的记载，八路军驻晋办事处的活动大体是：

一九三六年十月，彭雪枫受陕北中共中央的派遣到山西做阎锡山的工作。彭雪枫作为中共代表秘密到太原后，设立了中共办事处。阎锡山派山西省政府委员、太原绥靖公署政治部主任梁化之作为阎锡山的全权代表，同彭雪枫接触联系。阎锡山同时和蒋介石方面、日本方面秘密接触。一九三七年八月底，中共办事处公开挂出“国民革命第八路军驻并办事处”的牌子。办事处前的卫兵、办事处内的工作人员将便服改为八路军军服。彭雪枫以“八路军总司令部参谋处处长兼八路军驻并办事处处长”的身份公开活动。

众所周知，蒋介石对中共提出的统一战线主张迟迟没有表态。直到九月二十二日，才由国民党系统的通讯社公布中共中央提出的《国共合作宣言》。二十三日，蒋介石发表谈话，表示要共同御侮，承认了中共的合法地位。从此，全国抗日统一战线实际形成。山西省的抗日统一战线是全国的先驱，早于全国。

八路军驻晋办事处的任务，主要是迎送经太原到正太铁路和全省各地抗日前线的八路军部队，从阎锡山处领下武器、弹药、医药品、通信器材分配给各支八路军部队。办事处为周恩来同阎锡山谈判，建立统一战线关系进行联络工作。据岳夏回忆，山西驻晋办事处进行统一战线工作有三个层次：周恩来、程子华（战地总动委会方面）、薄一波（牺盟会方面），都致力于同山西最高当局的军政官员进行统战工作；彭雪枫、肖克等，主要在山西军队中的高级军人、政界、教育界的著名人物、国内外记者等人中进行统战工作；办

事处通过合法的地位，以中共代表面目出现进行宣传、联络。

二、中共北方局和中共山西省委员会

两者都不是公开的机关。北方局是一九三七年八月从北平迁移到太原的。五月在延安参加白区会议后，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到了太原。北方局和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一同住在太原成成中学内。岳夏回忆，该校前半部分是办事处，后半部分住着中共山西省地下省委，前后联系很方便。

山西省委员会的书记是张友清。他是一九三六年十月底被任命的。同时，由北方局委任薄一波为受北方局直接领导的以领导山西省统一战线工作为主的工作委员会书记。薄一波领导牺盟会总部的工作。

地下党的工作重点也包括领导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在牺盟会中，通过秘密的中共党员开展工作，如牛荫冠在其中的工作就是具体的事例。这些事例有：

一九三七年底，撤到临汾的牛荫冠在牺盟会总部工作，他要向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张友清汇报活动情况。

一九三八年二月阎锡山在临汾召开温泉会议，决定发起成立“民族革命同志会”，经中共山西省委批准同意，牛荫冠、薄一波等牺盟会干部以个人身份加入同志会。

一九三八年，阎锡山决定在牺盟会、新军中建立核心组织“民族革命青年团”，根据中共山西省委张友清的指示，牺盟会中的党员干部加入该团，掌握该团的领导权。

三、临汾的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中共北方局和中共山西省委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初，太原形势危险时，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中共北方局机关和阎锡山的各个机关转移到临汾。周恩来、彭雪枫在太原陷落前离开太原。在临汾，两个机关仍相互联系。八路军办事处扩充了部分人员新增设了政治处主任汤平。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和周恩来回延安，由副书记杨尚昆主持工作。除八路军办事处、